

《美国经济评论》视野下的中国

——以1978年以前华人经济学家的文章为中心

李丹 邹进文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湖北武汉430073)

摘要:《美国经济评论》从1941年开始发表华人经济学家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到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前,该刊发表的有关中国学者对中国问题进行探讨的文章有17篇。本文对这些论文加以总结,试图勾勒出当时主流经济学界对中国研究兴趣所在,同时也可以探究华人经济学家对中国问题研究的旨趣与方法。华人经济学家对中国问题的研究范式包括专题性研究和整体性研究,专题性研究分为外贸与金融业的研究、国民生产总值与国民收入的测算、统计系统的评估以及工业化情况的研究;而整体性研究分为基于历史的理论性分析和基于数据的技术性分析。华人经济学家的研究成为学界了解中国经济的重要窗口,而中国独有的经济实践也为经济理论发展提供了新的土壤。

关键词:民国时期;改革开放以前;华人经济学家;《美国经济评论》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30(2020)04-0129-10

《美国经济评论》(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是由美国经济学联合会创办的学术期刊,它是经济学界的重要风向标。《美国经济评论》于1911年正式创刊定名,之前经历了《美国经济学联合会出版物》(Publications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1886~1907年)、《美国经济学联合会季刊》(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Quarterly,1908~1910年)和《经济学公报》(The Economic Bulletin,1908~1910年)等3个发展阶段。《美国经济评论》反映了美国经济学联合会的学术取向、价值尺度、问题意识、学科特色和专业进展^[1]。

《美国经济评论》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极具代表性地说明了美国经济学界乃至整个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问题的态度。《美国经济评论》对中国问题很早就开始关注,1913年哈佛福德学院的沃森(F. D. Watson)教授就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了针对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朱友渔1912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国慈善事业的精神》的评论文章。1917年经济学家缪斯(A. C. Muhse)发表了题为《中国的贸易组织和贸易控制》一文,而华人经济学家的相关研究开始于1941年刘大中发表的《论中国的外汇问题》。尽管自亚当·斯密以来,欧美经济学家一直掌握着现代经济学的话语权,但华人经济学家以其特有的

收稿日期:2020-04-0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近代外文经济思想文献整理与研究”(15AJL008)

作者简介:李丹(1992—),男,湖北黄冈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邹进文(1964—),男,湖南益阳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背景知识和语言优势在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为流经济学界了解中国提供了重要窗口。虽然直至改革开放前,现代经济学并未被中国广泛接纳,但以《美国经济评论》为代表的流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并未停止。在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形成了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的独特认识,这也为中国后来引入现代经济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奠定了基础。1978年之前,《美国经济评论》上华人经济学家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共有17篇文章,其中5篇是学术论文,12篇是书评^①。本文主要通过对这些论文加以研究,试图勾勒出当时流经济学界对中国研究的兴趣所在,同时也可以探究华人经济学家对中国问题研究的旨趣与方法。

在一般的统计性研究中,书评及年会论文通常都会被排除在外^[2]。但实际上在早期的《美国经济评论》中,书评与文章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直到1968年《经济文献杂志》(JEL)创立后,书评部分才从《美国经济评论》中移出。1968年以前,《美国经济评论》中一直有大量的书评,篇幅约占整期内容的一半以上,它是一个经济学界交流思想的重要媒介。每当有学者出版新书就会向编辑部提交,由编辑转给该领域的权威人士撰写书评^[3]。不言而喻,这12篇书评的作者也是当时中国问题研究领域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在书评中所表达出的思想反映了美国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的态度,因此本文没有将书评和学术文章进行区别对待。5篇学术性文章中有4篇是年会论文,1篇是常见的长篇论文。直至2018年《美国经济学会联合会论文与议程》(AEA Papers and Proceedings)独立成刊前,这些年会论文及其讨论一直收录于《美国经济评论》中。这些年会论文同样也是本文重要的研究对象,并没有区分。

一、文献综述

1978年以前《美国经济评论》中华人经济学家关于中国问题研究的17篇文章中有5篇文章的作者是刘大中,其中有4篇学术论文(其中2篇是与叶孔嘉合作的)和1篇书评^②。此外12篇文章包括叶孔嘉的2篇书评^③,李卓敏的1篇学术论文和4篇书评^④,吴元黎的4篇书评^⑤,赵冈的1篇书评^⑥。而对这些文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刘大中的4篇学术论文方面。

在国内方面,宋丽智对刘大中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论中国的外汇问题:一个建议性解决方案》《美国的消费和投资倾向:战前与战后》《中国大陆经济的结构变化:1933年至1952—1957年》《中国大陆国民收入初步估计:1952—1959年》《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经济:一个数量上的评价》等5篇文章进行了介绍和评述^[4]。邹进文对刘大中的《论中国的外汇问题:一个建议性解决方案》一文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文章的背景和主要内容进行了分析^{[5][6](P378-383)}。尽管国内相关的研究数量较少,但对文章的分析较为详尽。

与国内的情况类似,国外对这17篇文章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刘大中的3篇论文上。Borox认为《论中国的外汇问题:一个建议性解决方案》是中国人第一次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文章^[7]。实际上第一位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文的中国人应该是林霖。Tinn指出《中国大陆经济的结构变化》一文探讨了中国经济统计数据中的“不准确和故意歪曲”情况,并进一步估计中国经济的实际表现^[8]。Simonis发现《中国大陆经济的结构变化》反映了中国农业与工业之间的互相替代现象^{[9](P48-49)}。Klein认同《中国大陆经济的结构变化》中对中国统计数据的质疑,因为这些数据在质量和数量上都达不到统计学所要求的标准^[10]。

刘大中与叶孔嘉的《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经济》一文也受到了大量关注。Perkins对文中的结论持保留态度,并指出20世纪60年代对国民收入和生产的各种估计不胜枚举,刘大中和叶孔嘉的估计有很重要的研究价值,然而,这些估计仍有值得商榷的地方^[11]。Keesing认为该文章过于强调中国经济增长中负面的内容,而实际上中国自1957年以来的增长率一直高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12]。Wu指出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对中国国民收入的学术研究主要基于20世纪50年代发布的官方统计数据,刘大中、叶孔嘉等人在估算国民收入和评估经济绩效方面做了最重要的开拓性工作^{[13](P7)}。Field分析比较了四组1970年和1971年中国国民收入的估计情况,认为刘大中、叶孔嘉和Ashbrook的估计太低,Eckstein的估计比较准确,而Rawski的估计有点偏高^[14]。

Long 认为该文是在近似的基础上构建投资的时间序列,然后用于估计资本存量,这种假设通常是不合理的^{[15](P30)}。Jefferies 指出,尽管刘大中、叶孔嘉对 1952~1956 年期间数据的可靠性提出了质疑,但两人仍然认为这些数据足以支撑他们的工作。他们先估算了四个部门的总产值,然后根据 1952~1957 年的数据,推算出 1961~1970 年的投入产出系数,最后得出了中国国民收入的测算值^{[16](P166-167)}。

总的来说,现有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刘大中的一篇或多篇文章,并没有整体地探讨改革开放之前华人经济学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实际上这 17 篇文章有很强的时代特征和思想内涵,需要一个提纲挈领的研究来抓住思想脉络的发展,《美国经济评论》视野下的中国也将由此展现。中国学者发表的有关中国问题的 17 篇文章按其研究的侧重点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专题性的,对中国经济的某一个方面如外贸、金融、国民收入、统计系统等进行研究,包括 3 篇学术论文和 7 篇书评;另一类是整体性的,对整个中国经济发展问题进行讨论,包括 2 篇学术论文和 5 篇书评。单从数量上就可以看出,专题性的研究要多于整体性的研究。同时从时间角度来看,专题性研究(最早开始于 1941 年)早于最早的整体性研究(1955 年)。这样的研究发展特点与实际研究材料获得的难易程度一致,同时也符合研究过程循序渐进的基本逻辑。

二、关于中国问题的专题性研究

专题性的研究主要包括四个大的方向:外贸与金融业的研究、国民生产总值与国民收入的测算、统计系统的评估、工业化情况的研究。下面分别展开论述。

(一)关于外贸与金融业的研究

外贸与金融业的研究主要包括三篇文章,分别是刘大中的《论中国的外汇问题:一个建议性解决方案》和《中国的银行业与金融业》(书评),以及李卓敏的《中国的外贸与工业发展:1948 年以前历史的综合性分析》(书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与其他文章着眼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经济发展不同,这三篇文章都是研究民国时期的经济问题。

刘大中的《论中国的外汇问题:一个建议性解决方案》(1941 年第 2 期)一文是《美国经济评论》中华人经济学家对中国问题的最早研究,该文主要讨论了“孤岛时期”上海金融市场的外汇问题^[17]。“1938 年 3 月 10 日,华北伪政权下令准许中国、交通两行华北分行所发行之钞票在市场上再流通一年。余各银行钞票于三个月内一律收回”^{[18](P368)}。由此,大量法币涌入上海外汇市场,而国民政府实行外汇统制,买卖外汇需要经过财政部核准,但其核准数量远不及实际需求,外汇黑市就此形成。自 1938 年 6 月以来,英国政府出于自身在华利益的考虑秘密协助国民政府维持外汇市场稳定。而后于 1939 年 3 月公开设立中英外汇基金来维持汇率市场,但收效甚微。1940 年末国民政府又向美国政府求助而获批 5000 万美元的援助贷款。《论中国的外汇问题:一个建议性解决方案》一文正是从此背景入手,探讨中美两国应该如何联手稳定汇率,消除黑市。

作者指出当时国民政府面临的不仅仅是稳定货币的问题,其本质是抗日战争在金融领域的延续,是如何使用经济手段来扭转双方实力从而影响整个战局的问题。刘大中对黑市中的外汇需求和供给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并列出由此受益或亏损的各方,从而给出相应的补救措施。他指出中国政府需要美国政府的协助,首先冻结所有银行在沦陷区的外汇活动,再通过授权的方式使中国政府银行、美国财政部、联邦储备局以及一些重要的私人银行共同建立一个“中美双边清算协议”委员会。中美之间所有组织和个人的外汇业务都要经过该委员会的批准,并通过双边清算账户结算^[17]。

从刘大中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外汇管制思想的几个特点:首先,解决汇率剧烈波动的问题需要从市场机制的源头出发,单靠市场内的稳定基金无法解决问题。其次,英美政府治下的金融机构掌控了沦陷区的外汇交易,这是问题的关键。只有在美国政府支持下的“中美双边清算协议”才能真正地稳定汇率。最后,实际政策的实施要考虑到各方的利益。实际上,1941 年 4 月,中美、中英签订新平准基金协定,建立中英美平准基金委员会。该机构正是通过冻结外汇资金、建立外汇管理制度

的办法满足了合法的外汇需求,消减了外汇黑市^[19]。显然,这篇发表在美国经济学界权威杂志的文章受到了美国政府相当大的重视,刘大中的外汇管制思想被应用于实际操作中,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中国的银行业与金融业》(1943年第2期,书评)一文同样也是刘大中的作品^⑦。文中前半部分对所评价的著作内容作了简要的介绍。该书介绍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至抗战胜利之前,中国传统金融业、西方金融业与中国现代金融的发展情况。在文章后半部分,刘大中表达了对战后重建中的金融问题的关注。他认为中国战后金融控制不能马上放松,否则会造成混乱。如果战后中国因政治环境恶化和经济困难的原因而导致外商投资减少,那政府就要通过限制消费与通货膨胀式的国内融资来进行重建和发展^[20]。显然,刘大中十分重视金融工具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从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的表现来看,这一观点并未得到重视。

《中国的外贸与工业发展:1948年以前历史的综合性分析》(1957年第3期,书评)发表远晚于前两篇^⑧。李卓敏认为虽然这个历史性回顾并不是当前的热点,但对这段时期的了解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评价后来的经济变革。1920~1937年间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不错的进步,这加快了日本想要全面入侵中国的脚步,这与原书的观点刚好相反。此外,李卓敏还提到了当时国际贸易问题中的一些前沿思想,如关税对贸易的限制作用有限,白银对贸易平衡的重要性,各国之间的比较优势^[21]。

(二)关于国民生产总值与国民收入的研究

关于国民生产总值的研究一共有3篇,分别是吴元黎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与社会账户》(书评)和《共产主义中国的国民收入》(书评),刘大中与叶孔嘉的《中国大陆国民收入的初步估计:1952—1959年》。

《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与社会账户》(1959年第4期,书评)一文主要考察了1950~1957年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86%增长率这一估算值的可靠性^⑨。原书将总体经济分为四个部门,包括农业、非农商业、政府和家庭,再对各部门按个人消费、总国内投资、净国外投资和政府购买分类估算,并估算了金融投资应分配额度和储蓄率,最后将中美两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进行比较。吴元黎肯定了1952~1957年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不断增长的趋势,但对部分门类的核算有异议,如低估了早期的农业产出,对未记录的贸易如劳动服务出口没有进行估算,没有考虑苏联援助,低估了农村地区的个人储蓄等^[22]。

《共产主义中国的国民收入》(1962年第5期,书评)探讨了“大跃进”时期中国官方对相关经济数据的夸大情况^⑩。书中主要研究了1952年的国民收入估计情况以及对估计数据的相关应用。吴元黎指出时间跨度上的不足导致该书无法探讨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特点。此外还存在一些细节上的问题导致许多不必要的假设,进而使研究出现了一些武断的推测。例如没有考虑1952年的谷物产量可能存在低估的情况,工资结构比其他要素价格更“合理”的原因没有说明,有关军费、海外汇款等其他项目都没有很好的讨论^[23]。从这两篇文章可以看出吴元黎对中国经济发展较为肯定,他认为西方学者的研究低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

《中国大陆国民收入的初步估计:1952—1959年》(1961年第2期)一文对1952~1959年间国民收入的官方统计数据进行了验证。文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1952~1957年的初步估计,作者通过附加值法对粮食产量和工业品产量进行了估计。从数量上看,1952~1957年间,分类明确的工业产品产量增加了45%,而未分类的工业产品产量增加了200%。第二部分是对1958~1959年数据的推测。由于国家的食物配给量并没有提高,同时也没有大量的粮食出口,所以实际的粮食产量应该与人口增长率持平。虽然大量的资源被投入到钢铁制造业中,但其中有30%是无法用于现代工业的“土钢”。修正后的1958年与1959年国内产出增长率分别为14%和15%^[24]。

刘大中和叶孔嘉合作的这篇文章是1961年“美国经济学联合会年会”中“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论题的一部分。Joseph在会上对该文给出了评价,刘大中和叶孔嘉也对此做出了回应,这些内容都收录于《讨论》(1961年第2期)。第一,Joseph认同刘大中和叶孔嘉对中国官方数据中的农业数据和工业数据进行修正的做法,因为这两个部分占了国民收入的绝大部分,但Joseph认为在验证官方农业数据时使用的人均卡路里摄入量的标准存在过多的假设,这种做法抵消了官方数据中的粮食作物

产出增长。第二,Joseph认为文中对工业数据的估计是在全盘接受官方数据和只接受有详细产出情况的数据两个极端中间的折中办法,有一定的随意性。第三,Joseph指出文中国民收入增长率低于4.4%的这一结论并不合理。对于Joseph的三个疑问,刘大中和叶孔嘉也给出了相应的回答。首先,作者指出人均卡路里摄入的计算过程中并没有涉及过多的假设,相关数据都来源于官方。同时,作者对人均消费食物不变的假设并不意味着农业产出没有增长,粮食产量增长率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人口每年仍有2.5%的增长。政府通过提高粮食产出中用于食物消费的比例来满足人口增长带来的粮食需求,而实际粮食产量增长水平低于人口增长水平。其次,作者认为他们对工业产出的估计中囊括了所有重要的商品,以产出增长最快的未分类商品为上限可以确保假设的合理性。但不可否认,这样的估算方法会高估工业产出的增长率。最后,作者认为相比工业部门30%左右的增长率,4%的总增长率并非不合理。在工人数量大规模增加背景下,工业部门的产出增长不足为奇。但从总劳动人口来看,工人数量仅占总劳动力的3%,工业部门仍只是一个很小的部门,其对整个经济体的拉动作用有限^[25]。

(三)关于统计系统的研究

研究统计系统的文章一共有两篇,分别是李卓敏的《共产主义中国的统计系统,1949—1957年》与叶孔嘉的《共产主义中国的统计系统》(书评)。

论文《共产主义中国的统计系统,1949—1957年》与《共产主义中国的统计系统》原书都是李卓敏研究项目“共产主义中国农业”的一部分。《共产主义中国的统计系统,1949—1957年》(1961年第2期)一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国家统计局的基本情况,第二部分介绍了国家统计局的具体工作和发展,第三部分是对国家统计局数据质量的分析和评估。作者认为官方于1955年公布的关于1949~1953年的统计数据很糟糕,1954年之后的数据质量有所提高,包含范围也变广了。从行业来看,工业、贸易、农业的数据质量逐渐降低;从部门来看,国有、资本主义、个人的数据质量逐渐降低;在国有部门中,地方企业数据质量要差于央企,非主营业务的数据质量要差于主营业务;从指标上看,有形产出和重要产品、劳动力与工资、金融与成本数据质量逐渐降低。李卓敏认为以上问题主要是因以下原因造成:统计人员能力有限、混乱的原始数据、糟糕的企业管理、无序的测量系统和缺少标准化设备^[26]。

李卓敏的这篇文章是1961年“美国经济学联合会年会”中“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论题的一部分,Sidney在会上对该文给出了评价。Sidney认为李卓敏的研究从根本上探讨了1949~1957年间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这使得今后的研究将更多地集中在统计系统本身。李卓敏的研究中有两个值得思考的地方。其一,李卓敏的研究指出所有数据中最可靠的是国有企业的数据,而最不可信的数据是农民的家庭数据,Sidney认为这是因为农民为减少赋税增加收入,存在故意隐瞒数据的动机。其二,李卓敏的研究表明,政府在统计事务上有很大的影响力,这使得数据会被修改以符合政府的期望。这也使中央政府制订的经济等其他政策并不能基于中国的实际情况^[25]。

《共产主义中国的统计系统》(1962年第4期,书评)一文认为所评价著作是通过研究中国统计系统的发展和内部工作情况来考察中国官方数据的可靠性^①。首先,叶孔嘉对全书做了一个简要的介绍,全书的三个部分分别讨论了1952~1957年、1958年和1959~1960年三个时期国家统计局的组织结构及其统计数据的质量。叶孔嘉认为作者对数据的可用性方面关注不足,提出了很多问题却没有给出相应的解决办法。此外,不能排除底层的统计局可能存在两套数据,即分别用于政府制定计划和对外宣传。作者的结论存在两个问题:其一,1954~1957年间数据质量一直在提高,但1955年的农业数据质量是最好的,两者互相矛盾;其二,除了干部在收集整理中出现错误之外,并没有考虑其他导致数据质量不好的原因,同时作者忽略了一些重要的农业统计手册和新闻公报上的数据^[27]。

(四)关于工业化的研究

有关中国工业发展的文章有两篇,分别是赵冈的《共产主义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能源使用》(书评)和叶孔嘉的《共产主义中国的工业增长率及模式》(书评)。《共产主义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能源使用》(书评)(1964年第1期)指出原书主要是从电能、煤炭和石油三个方面考察了中国能源行业的发展情

况。赵冈考察了书中与朝鲜有关的电力数据细节,他认为中国的用电数据存在夸大的部分^{②8}。

《共产主义中国的工业增长率及模式》(1966年第3期,书评)一文指出原著是大量西方学者对中国官方给出的工业增长率的质疑的一部分^③。叶孔嘉对全书做了一个简要的介绍,全书主要包括四章,第一章讨论了各种形式的生产指标,第二章考察了工业产出指标的计算缺陷,第三章详细介绍了两个新的指标,第四章评估了新指标并与其他国家数据进行对比。其中重要的结论包括:1949~1959年间包括手工业在内的工业增长率为21%,而官方数据为29%;1952~1957年工厂产出的增长率为14%,而官方数据为19%;1949~1952年与1957~1959年间的工业增长率相对较高;原料工业的增长率远高于消费品工业的增长率。叶孔嘉指出,鉴于不同国家的技术水平差异,国家间的产出增长率比较意义不大,同时产品的价格波动也没有被考虑在内^{②9}。

三、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整体性研究

对中国经济问题的整体性研究可以分为两类:基于历史的理论性分析和基于数据的技术性分析。

(一)基于历史的理论性研究

基于历史的理论性分析主要有4篇文章,分别是李卓敏的《共产主义中国的前景》(书评)和《共产主义中国的经济发展,1949—1958年》(书评),吴元黎的《当代中国》(书评)和《中国新经济》(书评)。

《共产主义中国的前景》(1955年第3期,书评)一文主要是将原书作者对中国经济数据的预测与官方公布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④。李卓敏对该书内容做了一个简要介绍,该书分为六个部分:1949年前的权力斗争、共产主义的革命政策、中国历史上与现今的政权与人民、中苏关系、中国经济和政权的未来。李卓敏认为自然灾害加快了农业集体化的进程,但“农业合作化运动”能否使农业增产还有待观察。此外,李卓敏指出在作者假设的中国自给自足的模型中,估算的1952~1962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37%,人均收入增长率为8%,而这与官方公布的数据有较大的出入^{③0}。

《共产主义中国的经济发展,1949—1958年》(1960年第4期,书评)一文认为所评价的著作是对中国1949~1958年经济发展的一个历史性回顾^⑤。原书介绍了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从1949~1952年经济恢复时期开始,经过两个“五年计划”,中国经济结构开始转型,而后中国“继续以一个惊人的速度发展”。李卓敏认为作者引用的相关数据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1950~1955年间一直都存在的财政赤字被忽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被收归国有的土地只有四分之一而非全部,农业产量以毛重而非净重计算,使用的1957年数据是没有修正的早期版本等。这些都削弱了结论的可靠性^{③1}。

《当代中国》(1957年第5期,书评)一文是对论文集的一个短评^⑥。所评价的论文集包括论文、参考书目和编年史等共11篇文章。吴元黎对文中的一些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鉴于中国向苏联学习农业集体化导致农业产量不足的情况,Szczepanik提出的中国能很好地从历史中获得经验的观点值得怀疑。Hooten需要更多的资料来说明中国的经济结构及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所取得的成就。Szczepanik估算的中国国民收入投资率与中国的权威经济学家提供的数据大相径庭^{③2}。

《中国新经济》(1959年第3期,书评)一文评价了一位印度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⑦。吴元黎认为原书作者在一些事实上出现了纰漏,例如朝鲜战争爆发导致的价格波动,1954年以后中国国民产出及其分配的数据等都没有被考虑在内。但吴元黎认为该书从印度的视角对中国经济发展进行观察,有许多值得西方学习的地方。首先,中国的手工棉纺业和工厂棉纺业出现了同步增长的情况,因为它们的产品面向的消费市场不同,不存在竞争关系,而手工棉纺业的发展也降低了农村地区的失业率;其次,中国反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观点,主张通过移民来解决人口问题;最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得益于人才的纵向流动,同时大量的人口为各个方面的经济发展都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③3}。

(二)基于数据的技术性研究

基于数据的技术性研究主要包括三篇文章,分别是李卓敏的《中国经济》(书评)、刘大中的《中国大陆经济的结构变化:1933年至1952—1957年》以及刘大中与叶孔嘉合作的《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经济:一个数量上的评估》。

《中国经济》(1958年第3期,书评)一文所评价的著作是关于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研究^⑥。李卓敏认为该书作者全盘接受了中国政府的官方数据,其统计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和政府高层报告。中国1930年的统计数据很少,对比1952年或1955年数据与战前数据意义不大。此外,大量的重要数据被忽略。具体来看,原书作者认为中国政府没有通过发行纸币来减少财政预算赤字,实际上1955年1月的中文报纸报道了政府通过发行纸币来填补赤字的情况^[34]。

《中国大陆经济的结构变化:1933年至1952—1957年》(1959年第2期)一文通过对比1933年与1952~1957年间国内生产和消费的变化情况,分析中国的经济结构变化。文章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国民产出估计的覆盖面和可信度。作者认为中国政府出于宣传目的对一些数据,例如消费品产量的价值、零售业销售额、工资率等进行了夸大,因此要进行一些修正,其中情况最严重的是生产原料产量的数据。另一方面,中国官方很重视人口统计,因而人口数据要可信得多。第二部分是对数据的估计。作者通过两个表格分别列举了产出净附加值中农业、现代非农业、政府管理、其他经济四个部门的百分比和国内产出用于个人消费、政府消费、投资的估算值,同时每个估算都用1933年和1952年的商品价格各计算了一次。第三部分分析了1933年的经济状况。第四部分是1933年与1952年的经济结构和机制比较。1952年的产出净附加值中,农业与其他经济比重降低,而现代非农业与政府管理比重上升。1952年现代制造业产品的价格是1933年的4倍,手工业产品是过去的2.3倍,而农产品只有过去的1.8倍。在这样的价格机制下,农民需要缴纳农业税,同时将超产的农产品低价卖给政府,并高价买入生活必需品。而政府企业则能够用低价采购手工业和农业的原材料,并从中获得更高的利润。第五部分是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分析。作者指出,“一五计划”有两个重要的特点:首先,农业生产被忽视了,这可能是由于政府高估了农业生产力,或是没有意识到农业在工业化中的重要作用;其次,苏联援助建设的都是现代的大型资本密集型工厂,而用大量劳动力替代成本的制造业却完全被忽视了。比较1952~1957年间的国内生产和消费增长率可以看出,每年的增长率波动很大,作者认为出现这样的波动并非中国政府所说自然灾害的缘故。作者指出,现代非农业部门确实取得了惊人的增长,但现代非农业部门只占总经济体的20%。同时,现代非农业部门的增长是以人们被迫处于一个较低的生活水平为代价的。总的来说,整个“一五计划”中农业生产没有达到预期,增长率只有4%,人均粮食消费低于1933年水平。这主要是由于农民在1955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失去了土地,从而失去了生产的积极性。第六部分是结论。“一五计划”这段时间内中国的钢铁产量从1952年的140万吨增长到1957年的500万吨,水泥产量从290万吨增长到680万吨,但这样的成就是建立在牺牲了人们生活水平的基础之上,而农业不发达将会限制工业化进程。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虽然带来了一定的农业产出增长,但由于监督加大而带来的增长并不会长久^[35]。

刘大中的这篇文章是1959年“美国经济学联合会年会”中“非苏联共产主义经济”论题的一部分,William对该文做出了评论。William与刘大中的看法相反,他认为“一五计划”是成功的,而非失败。中国政府在保证产出增加的情况下,全面掌控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刘大中认为产出与投入的无规律性标志着计划的失败,而William指出,当期农业的产出将对下期的其他经济产生影响,将农业产出数据滞后一年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们之间的关系。此外,刘大中将1933年的数据与1952~1957年的数据对比发现,人均产出、人均资本消费均出现了下降,并由此得出“一五计划”失败。William认为这个观点并不准确,因为1933年的农业产量被大大高估了。William也并不赞成“人民公社运动”,认为这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结社形式^[36]。

《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经济:一个数量上的评估》(1973年第2期)一文估算了中国大陆1961~1970年间的国内生产总值,并比较了亚洲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增长率。全文共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用产业间关系和总附加值的估计方法估算中国大陆1961~1970年间的国内生产总值。作者将投入产出数据分为四大类(农业、工业、交通和贸易以及其他),并由此得到各行业间投入—产出系数。作者通过各行业1961~1970年与1957年的比率变化分别给出了四个部门产出的最高估值和最低估值。第二部分是对初步的估计进行处理。作者认为中国的农业产出被低估了,而工业产出被高估了。

因此分别把农业产出的最高估值和工业产出的最低估值作为最接近实际的产出值,并由此估算出贸易和交通部门以及其他部门产出的最佳估计。通过分析数据可以看出,由于“大跃进”运动,1957~1961年GDP发生倒退,直到1963年才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并于1966年达到最高峰。而“文化大革命”导致1966~1968年再次出现倒退,1969~1970年才开始恢复。第三部分是几个亚洲国家增长率的比较。作者选取了几个有良好统计数据的亚洲国家或地区与中国进行比较。通过比较发现中国和印度的GDP增长率和人均GDP增长率都很低。菲律宾的情况略好于中国和印度,而日本、中国台湾地区、韩国以及泰国的GDP增长率和人均GDP增长率都处于较高的水平。尽管所有的亚洲国家或地区都有很高的人口增长率,但日本等国家仍保持较高的人均资本。同时,中国的资本产出率最低,这可能是由于中国投资了大量收益缓慢的项目。而日本尽管资本产出率也很低,但它有先进的技术和较低的人口增长率来维持高水平的GDP增长率和人均GDP增长率^[37]。

刘大中和叶孔嘉合作的这篇文章是1973年“美国经济学联合会年会”中“当前形势下中国经济”论题的一部分,Richard和Thomas分别在会上对该文做出了评价。Richard指出刘大中和叶孔嘉的研究表明,中国在1961~1970年间固定投资占GDP的18%~24%,这对一个十分贫困的国家来说是很不可思议的。此外Richard还考察了总固定资本增量一产出的比率,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Richard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工业产出被高估,或是农业产出被低估,抑或是因为投资的项目效率较低的缘故。Thomas指出固定投资的增长远低于主要生产原料的产出增加,这并不合理。此外,人均消费资本在1965~1970年间只增长了3%,这个数据也难以令人信服^[38]。显然,由于基础条件与外界环境不同,中国选择了与其他亚洲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早期对重工业投入的倾斜使中国的GDP增长率和资本产出率都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但从后来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到,正是这些工业基础为后期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保障。

四、结论与评论

1978年以前《美国经济评论》中讨论的中国问题主要集中在对国民收入统计数据的相关考察。大多数经济学家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表示肯定,而对官方数据存疑主要源于1958年后的“大跃进”时期。其中,刘大中、叶孔嘉和李卓敏在这方面的贡献最为重要,他们分别采用数值估算和统计系统考察的方法对官方数据的可靠性加以验证。由于缺乏其他的资料或数据加以验证,这些研究均在国民收入估算中使用了一些假设,却没有给出相应的条件,这降低了其估算的可靠性。吴元黎和赵冈则主要以书评的形式对中国相关问题的研究进行了评价。吴元黎认为西方学者的研究低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其发展模式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而赵冈则认为中国的统计数据存在一定的误差。此外1978年以前《美国经济评论》中研究的中国问题还关注了对民国时期的金融业,其中包括对外汇情况的考察和对商业银行发展的历史性回顾。值得一提的是刘大中的相关研究得到了美国政府的认同,并被付诸实践。

从1941年到1973年,这33年仅仅有5位中国学者关于中国问题研究的17篇文章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这表明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远没有进入世界经济研究的主流。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摒弃西方经济学、皈依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使中国大陆经济学界切断了与西方经济学界的联系,只有少数离开中国大陆进入美国的华裔经济学家仍然延续了民国时期经济学西学东渐的路径。他们运用当时国际上流行的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对于总结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提供了新的视角。由于中西方的隔离,他们的有关研究成果并没有引起当时中国大陆学者的关注,更无法影响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但这些研究,仍然具有思想史的价值,为反思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提供了新的角度。他们对中国大陆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成果能够在《美国经济评论》这样的顶级经济学学术期刊上发表,一方面说明了他们的研究水平达到了进入西方经济学学术之林的程度,另一方面也说明尽管当时中西对立隔绝,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对中国经济发展仍然十分关注,希望加以深入研究。

应该指出的是,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论文的这几位华人经济学家 1949 年以前大多供职于国民政府或民国时期的大学,他们离开中国大陆进入西方学术圈,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大陆经济展开分析,但由于对中国大陆经济制度的隔膜与反感,以及无法实地考察中国经济,他们并没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经济上取得的巨大成就给予太多积极的评价,有时甚至存在误解与诋毁。显然,这种思想上的歧视出现于经济学研究中,但并非来源于经济现象本身。改革开放至今已有 40 余年,中国经济发展举世瞩目,这本身就是对这些误解和诋毁的最好回应。经济思想可能会受政治观念或历史环境的影响,但一个好的经济理论则应该要回到经济现象本身。1978 年以前华人经济学的研究有他们固有的局限性,而我们更应该看到他们为克服研究中的困难运用前沿经济理论而做出的努力,学习他们积极观察中国经济现象并为之提供理论解释的自信。

注释:

- ①另外还有一篇《讨论》是刘大中与叶孔嘉在 1961 年年会上对相关问题的回应。该文作为原论文的一部分,并未单独统计。
- ②刘大中(1914—1975),著名计量经济学家,是《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收录传记的唯一一位华裔学者。1940 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任教于清华大学。1948 年再赴美国任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958 年在康乃尔大学任教授直至逝世。
- ③叶孔嘉,生卒年不详,清华大学学士,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后在美国成为 RAND 公司的高级经济师以及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中国经济研究小组成员。
- ④李卓敏(1912—1991),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哲学博士。曾任南开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和国立中央大学经济学教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工商管理学教授,1964~1978 年担任香港中文大学创校校长。
- ⑤吴元黎(1920—2008),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得主哈耶克。1949 年移居美国,任旧金山大学经济系教授。1969~1970 年间被聘任为尼克松政府的国防部助理部长,负责政策制定和国家安全。
- ⑥赵冈(1929—),美国密歇根大学博士。先后任教于美国密歇根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威斯康星大学、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史。
- ⑦原书的作者为 Frank M. Tamagna,任教于华盛顿大学。本书于 1942 年由太平洋关系研究所出版于美国纽约。
- ⑧原书的作者是郑友揆(1909—1999),浙江镇海人,1932 年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曾任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本书于 1956 年由华盛顿特区大学出版社于美国华盛顿出版。
- ⑨原书的作者是 William Wallace Hollister。本书由自由出版社于 1958 年在美国伊利诺伊州格兰克出版。
- ⑩原书的作者是 Alexander Eckstein,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任教于密歇根大学。本书由格兰克自由出版社于 1961 年出版。
- ⑪原书的作者是李卓敏,《共产主义中国的统计系统,1949—1957》一文正是该书的一部分。该书由加州大学出版社于 1962 年出版。
- ⑫原书的作者是吴元黎,该书由 Frederick A. Praeger 出版社于 1963 年出版。
- ⑬原书的作者是赵冈,该书由密歇根大学出版社于 1965 年出版。
- ⑭原书的作者 Walt W. Rostow 是美国经济学家,著有《经济发展的阶段:非共产主义宣言》。该书由密歇根大学出版社于 1965 年出版。
- ⑮原书的作者是 T. J. Hughes 与 D. E. T. Luard。Luard 曾担任英国外交部国会副国务卿。该书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于 1960 年出版。
- ⑯原书由 Edward Stuart Kirby(1909—1998) 编著,由香港大学出版社与牛津大学出版社于 1955 年出版。
- ⑰原书的作者是 Gyan Chand,印度学者,著有《中国的民主》(1958) 等书。该书由 Vora & Co. 于 1958 年在印度孟买出版。
- ⑱原书的作者是 Solomon Adler,曾担任美国财政部经济学家。该书由每月评论出版社于 1958 年在美国纽约出版。

参考文献:

- [1] 邢源源.《美国经济评论》百年发展历程[J].经济学动态,2011,(5):98—103.
- [2] 张亚光,毕悦.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的本土化创新与体系构建——基于国际顶级期刊的华人学者文献述评[J].东南学术,2018,(6):73—82.
- [3] Margo, R. A.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A Century's Explosion of Economics Research[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1, 101(1): 9—35.
- [4] 宋丽智.刘大中经济思想研究——以《美国经济评论》的 5 篇论文为中心[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156—166.
- [5] 邹进文.中国近代货币思想的发展:以留学生英文博士论文为中心的考察[J].求索,2017,(9):45—52.
- [6] 邹进文.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以留学生博士论文为中心的考察[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 [7] Борох, О. Н. Лю Дачжун и «Академическая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науки Китая (1947 г.) [J]. Общество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в Китае, 2016, 46(20—1): 316—327.
- [8] Tinn, H. Modeling Computers and Computer Models: Manufacturing Economic-Planning Projects in Cold War Taiwan, 1959—1968[J]. Technology and Culture, 2018, 59(5): S66—S99.
- [9] Simonis, U. E. Die Entwicklungspolitik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1949 bis 1962: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Technologischen Grundlagen[M].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68.

- [10] Klein, S. The National Income of Communist China(Book)[J]. The China Quarterly, 1962,(12): 234—239.
- [11] Perkins, D. H. Research on the Econom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 Survey of the Field[J].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83, 42(2): 345—372.
- [12] Keesing, D. B. Economic Lessons from China[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75, 2(1): 1—32.
- [13] Wu, H. W. How Rich is China and How Fast has the Economy Grown? Statistical Controversies.[DB/OL]. (1998)[2020—02—19].<https://digitalcollections.anu.edu.au/bitstream/1885/40389/3/cep98—3.pdf>.
- [14] Field, R. M. Some Overlooked National Product Data[J]. The China Quarterly, 1974, (59): 583—586.
- [15] Long, Z. Growth, Institutions and" Socialist Transi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D].Paris: Université Panthéon-Sorbonne. 2017.
- [16] Jefferies, W. R. From the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y to Capitalist Globalisation: How Economists Underestimated the Growth of the World Market[D]. Manchester: Manchester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2013.
- [17] Liu, T. C. China's Foreign Exchange Problems: A Proposed Solution[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41, 31(2): 266—279.
- [18] 宋佩玉.抗战前期上海外汇市场研究:1937.7—1941.12[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 [19] 杨雨青.中美英平准基金的运作与中国战时外汇管理[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 2010, 47(3): 68—82.
- [20] Liu, T. C. Banking and Finance in China (Book)[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43, 33(2): 427.
- [21] Li, C. M. Foreign Trad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China(Book)[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7, 47(3): 418.
- [22] Wu, Y. L. China's Gross National Product and Social Accounts, 1950—1957(Book)[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9, 49(4): 758—760.
- [23] Wu, Y. L. The National Income of Communist China(Book)[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2, 52(5): 1145.
- [24] Liu, T. C, Yeh, K. C. Preliminary Estimate of the National Income of the Chinese Mainland, 1952—59[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1, 51(2): 489.
- [25] Holzman, F. D., Klein, S., Berliner, J. S., et al. Discussion[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1, 51(2): 518—526.
- [26] Li, C. M. Communist China's Statistical System: 1949—57[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1, 51(2): 499.
- [27] Yeh, K. C. The Statistical System of Communist China(Book)[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2, 52(4): 853.
- [28] Chao,K.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Use of Energy Resources in Communist China(Book)[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4, 54(1): 160.
- [29] Yeh, K. C. The Rate and Pattern of Industrial Growth in Communist China(Book)[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6, 56(3): 571.
- [30] Li, C. M. The Prospects of Communist China (Book)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5, 45(3): 407.
- [31] Li, C. M.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ommunist China, 1949—1958 (Book)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0, 50(4): 746.
- [32] Wu, Y. L. Contemporary China(Book)[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7, 47(5): 716—717.
- [33] Wu, Y. L. The New Economy of China(Book)[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9, 49(3): 433.
- [34] Li, C. M. The Chinese Economy(Book)[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8, 48(3): 465.
- [35] Liu, T C. Structural Changes in the Economy of the Chinese Mainland, 1933 to 1952—57[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9, 49(2): 84.
- [36] Spulber, N., Hollister, W. W., Alton, T. P., et al. Discussion[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9, 49(2): 125—133.
- [37] Liu, T. C., Yeh, K. C. Chinese and Other Asian Economies: A Quantitative Evaluation[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3, 63(2): 215—223.
- [38] Eckaus, R. S., Rawski, T. G. Discussion[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3, 63(2): 232—235.

(责任编辑:易会文)